

一二两薄薪 良心千斤

——读马伯庸《桃花源没事儿》

徐静

得偿所愿，既入手马伯庸新作《桃花源没事儿》，又在他新书分享会上与他面对面。当他谈及“见微”系列——从《长安的荔枝》到这本新作的创作历程时，我终于解开长久的困惑：文学的意义，或许就藏在能陪我们熬过人生卡顿的文字里。马伯庸的故事便是如此，照见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悲欢，陪我们走过人生起伏。

“见微”取“见微知著”之意。“见微”系列最动人的魔力，是以极小切口剖开宏大命题，让读者在琐碎日常里撞见深刻哲思。《桃花源没事儿》灵感源自《桃花源记》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马伯庸拂去陶渊明笔下“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田园滤镜，将笔触落向人间烟火——这里的桃花源没有仙气，满是妖怪们的家长里短：谁家地界被占半分，哪个小辈惹了是非？琐碎得像巷弄里的饭菜香，热热闹闹。

主角小道士玄穹，堪称“三界最惨打工仔”。为谋生在桃花源当俗务道人，日常没有斩妖除魔的壮举，只有调解纠纷、登记证件的杂事：今天劝狐妖别跟树精为半尺地界争吵，明天盯着西海太子别私放洪水淹良田，活脱脱的“妖怪居委会主任”，日子成了写满家长里短的台账。可这个看似“没出息”的角色，却戳中当代人的心——他月薪仅二两三钱，应付完没完没了的“琐事”，平衡错综复杂的“关系”，像极了被绩效、人际关系压得喘不过气的我们。

玄穹的“穷命”，是全书最犀利的伏笔，也是最温柔的慰藉。他天生“遇财成劫”，沾半点横财就遭天打雷劈，注定困在桃花源做基层道人，断了“一夜暴富”的念头。这个设定戳破当代人的“财富迷信”——当“不富即罪”的焦虑漫过生活，当我们以为“有钱能解决一切”时，玄穹让我们看见：财富受限时，人更能盯住重要的事。调解纠纷时，他看重“邻里和睦”的小功德；阻止洪水时，他惦念“桃花源不乱”的责任。“工资二两，良心无价”，这句话在读者心里激起涟漪。

马伯庸最厉害，是把桃花源拽进现实，让妖怪的烦恼与我们的生活无缝衔接。青丘狐族考“化形资格证”，像极了现代人挤破头考公考编；就连白素贞，也会为许仙的背叛索要“公道”，活脱脱是当代感情纠纷里的普通人。

这些妖怪的烦恼，与我们为绩效焦虑、为学区房奔波、为感情失眠的愁绪，本质并无不同。我们总以为换个环境能避开烦恼，却发现走到哪都逃不过“规则”的网和“琐事”的缠。但马伯庸没让故事停在悲观里，玄穹处理琐事的坚持，都是对现实“修罗场”的温柔反抗：帮老槐树精补办“古树保护证”，是对抗功利；阻止强拆狐妖聚居区，是守护善意。这些微小举动，像极了为小区绿化抗议的业主、为流浪动物发声的普通人——我们或许没能改变世界，却能在能力范围内为人间留份温度。

近年来国内兴起微观史潮流，马伯庸的“见微”系列正是文学领域的微观史实践。在他眼中，只有了解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痛苦与愿望，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玄穹常说“不沾大因果，攒点小功德”，藏着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他不惦记飞升成仙，不妄想颠覆规则，只在权责里把小事做扎实。这恰是当代人急需的精神解药。我们总被“宏大叙事”牵着走，渴望成为大人物、做惊天大事，却忘了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平凡中过日子。玄穹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不等于平庸，琐碎里藏着修行真谛。

就像小区里退休后仍张罗琐事的老书记，看似管“鸡毛蒜皮”，却是维系人间安稳的基石。所谓修行，从不是深山打坐的孤寂，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而是在琐碎里播下种子——今天多份耐心，明天多份责任，总有一天会发芽，长成守护自己、温暖他人的力量。

合上书，窗外车水马龙依旧，晚高峰的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在奔波、烦恼，却也在各自的“桃花源”里坚守。我们或许没有书中的世外桃源，但能在自己的“二两三钱”里守住良心，在琐碎中攒下“小功德”，在这人世间种出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红孩怎样谈散文

——序《散文是说我的世界——红孩谈散文》

肖云儒

有追求的作家，形成风格之后，尽快从“过去的我”走向“今天的我”“今后的我”，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如果说“形散神不散”是从中国美学的形神关系来谈，“确定非确定”则带有相当的哲学色彩，它是从静与动、不易与变易、澄澈与模糊这些范畴的交相融通之处提出问题的。

《散文是说我的世界——红孩谈散文》是一本生气勃勃的书，红孩是个精力充沛的人。集子里的文章，通过紧密追踪二十多年来散文创作的足迹，宏观评述散文创作的态势和脉象，捕捉最新的创作现象（包括网络散文），质疑冒头的创作乱象，推介老中青几代散文家的作品。这是非常有温度的、时刻在场的散文评论。这些文字将会以它的思辨光彩和文献价值为当代散文史提供资料。红孩的评论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色彩。这些特色既来自他对生活和艺术、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感受，更来自他的气质和生命深处。

他敢于提出新观点却不追求惊世骇俗、哗众取宠的秀态，许多新见皆是如人论世、知书论艺中自然引出，从自己和作者的创作实践体悟在两相酬对自然引出。他提出散文写作的“确定和不确定”说；提出散文和诗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我的世界”；提出散文的非对称原则、散文要陌生化、散文是结尾的艺术；提出散文要从文字出发。文学、文化大体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提出要熟悉的生活充满诗意。不能做这一类，要做这一个；提出让评论家捉摸不定的散文家是好散文家，三五句能说清的反倒不是大家；提出没有故乡的人写不出好作品，每个作家都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气场、生活场和心理场，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灵魂才能安静下来，才能找到写作的最佳状态；提出名家一定要有名言，名家总是和他写的经典作品相联系，因而要重视单篇散文的推介奖励，等等。我说红孩新见迭出，恐怕没有人不同意。

他善于在评论中发挥逆向思维，敢批评、敢碰硬、敢亮剑，给散文批评注入了一股新风。敢指名道姓批评是因了评论家的责任和勇气，更是因了为人文的坦诚和率真，加之时时揉进一点幽默，读来毫无凌厉之感，倒显

被敌人所屈服”的战斗意志和英雄品质，又要忠实于历史事实，避免脸谱化、程式化、概念化的通病。既要通过战士之手痛快淋漓地杀日本人，又要避免把敌人写得过于愚蠢无能。既要努力写好正面人物，也要努力写好反面人物，无论日本人、汉奸，也都应该显得有血有肉有个性，力求真实可信又独特，使其与正面人物相辅相成，起到“怪峰托奇松”的衬托作用。

常言道：画鬼容易画人难，难就难在很难避免脸谱化、程式化、概念化。可喜的是，该书中对敌人的描写，却在努力避免这些弊端，力求塑造全新的、不雷同的人物形象。龟岛太郎是个“中国通”，心狠手辣，计多毒辣，他企图用残忍杀害一群狗的手段，来震慑和制服民众，以及龟岛太郎自诩精通中国古代兵法的自负狂妄，都写得活灵活现。黑木的野蛮残忍，山雄太郎的伪善奸诈，汉奸苟德世、虻蚤死心塌地甘做日本人走狗的丑恶嘴脸也刻画得入木三分。

该书通过这些人物的不同命运的转化，不仅使作品有了鲜明的对比性、批判性与警示性，而且再次证明了统一战线堪称制

胜法宝。坚持和完善统一战线，凝聚民族力量，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和平力量，不仅对中国过去功莫大焉，而且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是该书的启示之一。

近日，几乎一口气读完长篇小说《狼侠行动》，其深刻的思想性、浪漫的传奇性、鲜明的对比性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该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杨智华创作的抗日战争长篇小说《狼侠行动》体现了“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的抗战精品力作，是对抗战精神的生动阐述。

该书讲述了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疯狂扫荡的情节。小说通过“夺粮”主线，不仅刻画了八路军独立营营长肖剑、指导员马冲等抗日英雄形象，而且塑造了顺娃娘、顺娃、祝三宝等“匹夫”形象。顺娃娘的丈夫被日本人残忍打死，她带着三个孩子，与日本人黑木、汉奸虻蚤进行机智灵活的周旋，后来又点燃了日本人的炮楼，为拔掉狗儿洼据点立了大功，表现出了身为村党小组长和妇救会主任的良好素质。书的最后写道，多年后已是耄耋老人的肖剑会见当年驻镇镇日军大佐龟岛太郎的孙子时说道：“遗憾的是，你的祖父至死也没明白，

他和他的帝国军队走向失败的真正原因，那就是邪恶永远不可能战胜正义。”该书具有浪漫的传奇性。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我追求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大胆涂抹传奇色彩。比如书中一号人物肖剑，不仅具有革命军人的理想信念，又有任侠侠胆、敢打必胜的突出个性，他智勇双全，有勇有谋，用兵如有神助，屡建奇功，连日军大佐龟岛太郎也不得不承认肖剑简直就是个高超的战争魔术师，计谋高深莫测，战术神出鬼没，将古老的中国兵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如此描写既让这个主要人物形象鲜明，也为整个作品的战斗性、传奇性奠定了基础。通过民间传说的艺术加工，小说巧妙引入义狼情节。如对义狼助战的描写，就是借鉴了民间口口相传的狼故事和狼传奇，化腐朽为神奇，随情节入理地进入故事链，为营造环境氛围、衬托主要人物和深化主题服务。

该书具有鲜明的对比性。在该书后记中作者夫子自道：既要刻画英雄人物的卓越风采，体现人民军队“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

意编织的隐喻——我们赖以生存的文明铠甲，在荒野的绝对力量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就像薛文超在浓雾中把树叶认作香水瓶，将荒草看成站岗军人时，理性世界的崩塌已然发生，剩下的只有本能的挣扎与对“存在”的迫切求证。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迷路”场景，更像是现代人对现代精神困境的精准映射。命运均数次在花板地、高山草甸偏离赛道，不是因为路标缺失，而是当“社会身份”被暴雨冲刷干净，他突然失去了前行的坐标。这种迷失在其他跑者身上同样上演：肖静在机耕路上失忆般茫然伫立，“不靠谱”因导航偏差在玉米地打转，芸姐为陪伴失温的步兵放弃领先机会……他们迷路的不仅是赛道，更是“我为何奔跑”的意义。当比赛成绩、排名等外部目标变得不再重要时，跑步者们被迫直面最原始的问题：没有了社会标签的“我”，究竟是谁？

而小说最动人的，恰恰是在这种困境中，人性迸发出的微光。邱总冒着生命危险，在75度陡坡的野竹林里背负失温的薛文超撤退，泥浆裹满全身却始终没放开对方；冷米村的农户给素不相识的命定均端来白砂糖拌饭，米粒晶莹如珍珠，甜意驱散了连日的疲惫；志愿者在补给站用筒裤包买袜子，给跑者烘干湿透的衣物，简陋的条件搭建起温暖的港湾。这些瞬间打破了“荒野即残酷”的刻板印象——当文明规则失效时，人类互助的本能，反而成了确认“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好证明。就像芸姐即便被关门退赛，也从未后悔陪伴陈开舒缓前行，这种选择无关成绩，只关乎对同类的共情与守护。

“泥丸”意象在书中的多重解读，更让作品有了超越故事本身的深度。它既是马蒙山上滚动的泥丸，也是道教文化中“脑神经根”的象征，更是个体在宏大困境前的渺小隐

出了热络和亲切。我为此喜欢上了红孩，这是个可以深交的人。他推散文化散文、大散文、行走散文、新散文这些关联着名家且已被散文界认可的提法。他痛陈散文“八怪”的乱象。他质疑散文创作文史资料化、哲思化、随笔化、小品文化、游记化等是否有利于发展。他正面回答为什么不将陶铸的名篇《松树的风格》收入自己主编的散文选本。他认为刘锡庆评价史铁生、素素评价余秋雨有失当之处，便催马向前，专文商榷——指出自己认为的过誉之词，说出一番道理来。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早些年，时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的他，不同意有人在会上当着时任会长林非先生的面，将林非的散文《离别》和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相媲美，认为《离别》是当代散文的高峰。他竟直接以《（离别）能称为当代散文的（背影）吗》为题，公开谈出自己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篇都是好文章，同一题材的作品，在比较中，得与失容易显而易见。这种得与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标准。我的看法是《背影》就是《背影》，《离别》就是《离别》，《离别》绝不是当代散文中的《背影》。如果非论个短长，从个人的喜爱程度看，我还是推崇《背影》。”这是何等的人格力量和学术勇气。散文界、文艺界需要这样有锋芒、有尊严、讲道理的批评风气了。

红孩的散文理论和评论常常以人在事中的真切感受为出发点，对年度的或某个时期或某种类型的散文创作进行爬梳整理。在梳理中归纳，归纳中分析，分析中深化，时时有独立见解，常常能总揽全局。“创新，创新，创新”，是他二十年来有增无减的呐喊。他的评论思维和评论文字“从不装腔作势，叫卖新词，更不整天背着主义捉弄人，能让最普通的散文爱好者看明白”。红孩一把甩掉了，或者说从来就没有穿上过学者、精英和绅士的大氅，他从讲坛上走下来，身着休闲装，在散文的草坪上轻松地溜达，亦庄亦谐地说自己想说的，那是挚友相见，推心置腹，时不时有激情流淌，时不时有智慧闪光。隔三岔五，还撒上一星半点幽默的胡椒粉，让你“大快朵颐”。

红孩既是散文理论家又是创作者，学术与创作相互成就。大家都感到当代散文理论

滞后，内里原因多多，有一点恐怕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散文写作的亲身实践，理论不免架空。红孩不同，他大批量地写散文，大批量地编辑、评论、研究散文，大批量地主编出版大型散文丛书。他对每项工作都津津有味、干得风生水起，有“舍我其谁”的岗位意识和责任担当。他将职业、事业、文化责任和生命追求熔于一炉，几十年来就这样苦并乐着。

摆在面前的这本书是散文研究评论集，但透过作者所评论的散文现象和散文作品，分明能看到一个辛劳的身影，为写作、为编辑、为评奖、为讲课、为研讨采风活动、为全国各级散文学会事无巨细地工作，马不停蹄地忙碌。散文是“说我”，说自己的，评论则是“说他”，说人家的。但红孩在说别人的创作时，如此恣意而尽兴，不经意中便处处说出了自己，说出了一个个生命力和创造力都蓬勃得让人羡慕的红孩。这个“红孩”果然功夫了得、智慧过人，敢说敢想、能写能干，活灵活现地让我们领略了《西游记》中那个从天上折腾到地下的“红孩儿”的风采。

也许正是这种潜沉于散文事业和散文创作深处的多方面的实践，使得红孩的评论文字有温度，有个性，有生命感。若要说这本书的不足，我以为，一是对一些新的、好的见解还可以阐发得更充分更深透，让评论之力量、思辨之美得到更多展示和发扬。二是由于有些文章是在不同场合同一主旨的演讲，难免内容交叉重复，作者不妨再刮一些油水，作一点瘦身运动。

为了体验红孩的评论，便引用一段他的文字与各位共享并作结：

“我不是纯粹的学院式理论家，我是读者，是作者，是研究者，是记者，是王蒙文学的追随者，是这个会议的关注者，也是一个极想发言表明我观点的人。我不说，我不抢着说，我怕别人先说，别人先说我就不好再说，我就得转化思路，我就得顿悟，我就得冥思苦想，我就得见招拆招，我就得一鸣惊人，我就得与众不同，我就得发飙，说一些歪理邪说，说一些你不敢说的话，说一些你想不到的话，让王蒙先生知道我，让与会者知道我，让这个会结束后大家还议论我。哈哈，请允许我模仿王蒙先生的叙述方式表达我思想方式。”



胜法宝。坚持和完善统一战线，凝聚民族力量，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和平力量，不仅对中国过去功莫大焉，而且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是该书的启示之一。

《狼侠行动》：兼具思想深度与传奇色彩的抗战力作

王新民

近日，几乎一口气读完长篇小说《狼侠行动》，其深刻的思想性、浪漫的传奇性、鲜明的对比性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该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杨智华创作的抗日战争长篇小说《狼侠行动》体现了“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的抗战精品力作，是对抗战精神的生动阐述。

该书讲述了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疯狂扫荡的情节。小说通过“夺粮”主线，不仅刻画了八路军独立营营长肖剑、指导员马冲等抗日英雄形象，而且塑造了顺娃娘、顺娃、祝三宝等“匹夫”形象。顺娃娘的丈夫被日本人残忍打死，她带着三个孩子，与日本人黑木、汉奸虻蚤进行机智灵活的周旋，后来又点燃了日本人的炮楼，为拔掉狗儿洼据点立了大功，表现出了身为村党小组长和妇救会主任的良好素质。书的最后写道，多年后已是耄耋老人的肖剑会见当年驻镇镇日军大佐龟岛太郎的孙子时说道：“遗憾的是，你的祖父至死也没明白，

他和他的帝国军队走向失败的真正原因，那就是邪恶永远不可能战胜正义。”该书具有浪漫的传奇性。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我追求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大胆涂抹传奇色彩。比如书中一号人物肖剑，不仅具有革命军人的理想信念，又有任侠侠胆、敢打必胜的突出个性，他智勇双全，有勇有谋，用兵如有神助，屡建奇功，连日军大佐龟岛太郎也不得不承认肖剑简直就是个高超的战争魔术师，计谋高深莫测，战术神出鬼没，将古老的中国兵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如此描写既让这个主要人物形象鲜明，也为整个作品的战斗性、传奇性奠定了基础。通过民间传说的艺术加工，小说巧妙引入义狼情节。如对义狼助战的描写，就是借鉴了民间口口相传的狼故事和狼传奇，化腐朽为神奇，随情节入理地进入故事链，为营造环境氛围、衬托主要人物和深化主题服务。

该书具有鲜明的对比性。在该书后记中作者夫子自道：既要刻画英雄人物的卓越风采，体现人民军队“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

意编织的隐喻——我们赖以生存的文明铠甲，在荒野的绝对力量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就像薛文超在浓雾中把树叶认作香水瓶，将荒草看成站岗军人时，理性世界的崩塌已然发生，剩下的只有本能的挣扎与对“存在”的迫切求证。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迷路”场景，更像是现代人对现代精神困境的精准映射。命运均数次在花板地、高山草甸偏离赛道，不是因为路标缺失，而是当“社会身份”被暴雨冲刷干净，他突然失去了前行的坐标。这种迷失在其他跑者身上同样上演：肖静在机耕路上失忆般茫然伫立，“不靠谱”因导航偏差在玉米地打转，芸姐为陪伴失温的步兵放弃领先机会……他们迷路的不仅是赛道，更是“我为何奔跑”的意义。当比赛成绩、排名等外部目标变得不再重要时，跑步者们被迫直面最原始的问题：没有了社会标签的“我”，究竟是谁？

而小说最动人的，恰恰是在这种困境中，人性迸发出的微光。邱总冒着生命危险，在75度陡坡的野竹林里背负失温的薛文超撤退，泥浆裹满全身却始终没放开对方；冷米村的农户给素不相识的命定均端来白砂糖拌饭，米粒晶莹如珍珠，甜意驱散了连日的疲惫；志愿者在补给站用筒裤包买袜子，给跑者烘干湿透的衣物，简陋的条件搭建起温暖的港湾。这些瞬间打破了“荒野即残酷”的刻板印象——当文明规则失效时，人类互助的本能，反而成了确认“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好证明。就像芸姐即便被关门退赛，也从未后悔陪伴陈开舒缓前行，这种选择无关成绩，只关乎对同类的共情与守护。

“泥丸”意象在书中的多重解读，更让作品有了超越故事本身的深度。它既是马蒙山上滚动的泥丸，也是道教文化中“脑神经根”的象征，更是个体在宏大困境前的渺小隐

一场越野赛里的存在主义突围

——读俞永富长篇小说《和泥丸》

田冲

当命定均蜷缩在乌蒙山农户的走廊上，用两根玉米当枕头、裹着急救毯抵御寒夜时，他或许没意识到，这场450公里的越野赛，早已不是简单的体能较量——而是现代人剥离所有社会标签后，向存在本质发起的一场叩问。俞永富在长篇小说《和泥丸》中，以泥泞的赛道为画布，用跑者的喘息与挣扎为笔墨，绘就了一幅关于“人如何确认自我”的存在主义画卷，而“泥丸”这一核心意象，恰是解开这场精神困境的密钥。

不同于常规体育题材小说对“夺冠”“突破”的渲染，《和泥丸》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越野赛转化为“文明与荒野的角力场”。当跑步者们踏入乌蒙山时，随身携带的手机、充电宝、急救毯等现代文明产物，逐一暴露出脆弱性：手机在高山断网后沦为摆设，急救毯因设计缺陷挡不住雨水，连卫生巾都被当作鞋垫磨成纸浆。这些细节绝非偶然，而是作者刻

意编织的隐喻——我们赖以生存的文明铠甲，在荒野的绝对力量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就像薛文超在浓雾中把树叶认作香水瓶，将荒草看成站岗军人时，理性世界的崩塌已然发生，剩下的只有本能的挣扎与对“存在”的迫切求证。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迷路”场景，更像是现代人对现代精神困境的精准映射。命运均数次在花板地、高山草甸偏离赛道，不是因为路标缺失，而是当“社会身份”被暴雨冲刷干净，他突然失去了前行的坐标。这种迷失在其他跑者身上同样上演：肖静在机耕路上失忆般茫然伫立，“不靠谱”因导航偏差在玉米地打转，芸姐为陪伴失温的步兵放弃领先机会……他们迷路的不仅是赛道，更是“我为何奔跑”的意义。当比赛成绩、排名等外部目标变得不再重要时，跑步者们被迫直面最原始的问题：没有了社会标签的“我”，究竟是谁？

而小说最动人的，恰恰是在这种困境中，人性迸发出的微光。邱总冒着生命危险，在75度陡坡的野竹林里背负失温的薛文超撤退，泥浆裹满全身却始终没放开对方；冷米村的农户给素不相识的命定均端来白砂糖拌饭，米粒晶莹如珍珠，甜意驱散了连日的疲惫；志愿者在补给站用筒裤包买袜子，给跑者烘干湿透的衣物，简陋的条件搭建起温暖的港湾。这些瞬间打破了“荒野即残酷”的刻板印象——当文明规则失效时，人类互助的本能，反而成了确认“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好证明。就像芸姐即便被关门退赛，也从未后悔陪伴陈开舒缓前行，这种选择无关成绩，只关乎对同类的共情与守护。

“泥丸”意象在书中的多重解读，更让作品有了超越故事本身的深度。它既是马蒙山上滚动的泥丸，也是道教文化中“脑神经根”的象征，更是个体在宏大困境前的渺小隐

张斌峰诗集《孤旅》出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志勇）近日，张斌峰首部诗集《孤旅》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孤旅》是诗人在跨过知命之年，对大自然和人生进行哲学性思考的收获和总结。诗集在对古代先贤的回忆中，对人生旅程的沉思中，对花草树木的感悟中，从两个维度体现了“热爱”：热爱生命，一直在苦苦追寻生命的本源，拷问生命的内质，寻找灵魂与宇宙的交流；热爱风景，以风景为道场，透过花红柳绿、青山碧水这些鲜活的意象，感受大自然的呼吸与生命的律动。

针对当前诗歌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无意境、无韵律、无美感、无性情，以及意象晦涩、语言冷僻、追求怪异、难以读懂等弊端，诗人强调诗歌的意境与韵律、平实与内涵。《孤旅》就是他对对自己诗歌创作主张的实践与探索，着力意境的构造，铺张而不虚饰，华美而有法度，具有深广的内蕴和外延；诗歌语言通俗易懂，蕴含真挚的感情，让普通读者能够欣赏。

当最后一位跑者冲过终点，《和泥丸》留下的不是胜利的欢呼，而是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我们何尝不是在“社会赛道”上奔跑？被身份、功利、规则等裹挟，疲于奔命却忘了为何出发。而乌蒙山上的跑者们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存在”，从不依赖外部的认可，而在于困境中对自我的坚守，以及对同类的温柔。就像那颗滚过乌蒙山的泥丸，即便满身泥泞，也始终保持着向前的姿态——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